

病情史料发掘与沈从文再认识

唐东堰¹,唐东永²

(1.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2. 广西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 沈从文的家族存在着强大的“疯狂”遗传基因,这使得沈从文的感知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异常性”,并对其文学活动、精神流变与生命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期,沈从文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诸如《看虹录》《绿魇》《莲花》之类的“悦乐疯狂”之作,并产生了“神”、“生命”等超逻辑的思想命题,与这一时期他病情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沈从文;精神疾病;遗传基因;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 I20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6-0076-04

Exploration of Disease Materials and Recognition of Shen Congwen

TANG Dongyan

(1. Donghua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Jiangxi, Nanchang 330000;

2. Graduate Schoo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530021 Guangxi Nanning)

Abstract: Strong genetic gene of “craze” exists in Shen Congwen’s family. It made Shen Congwen’s way of perception present particular “abnormity”, which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spiritual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ife. Shen Congwen’s literary creating style changed a lot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his disease,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of the 1940s, a time when he created “pleasing crazy” works such as Record of Seeing the Rainbow, Green Nightmare and The Lotus, and produced super logical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 of “god” and “life”.

Key words: Shen Congwen; psychological disease; genetic gene; creating style

生平史料的考证与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沈从文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如凌宇的《沈从文传》、金介甫的《沈从文史诗》、吴世勇的《沈从文年谱》等等。它们为沈从文研究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掩饰的瑕疵。例如金氏的《沈从文史诗》虽考据精当,但过于依赖文献资料对沈从文情感的丰富性关注不够;凌宇的《沈从文传》虽无上述问题,却由于与沈从文的距离太近而“不能从深处抓住沈从文的弱点”。进入21世纪后,沈从文的史料发掘工作发展缓慢,学界对于沈从文其人、其文的认识大多仍局限在已有传记的格局。流于现成资料的辗转抄

录,那种建立在实地考察和访谈基础上的新发现并不多见。那么是不是沈从文生平史料俱已发掘完毕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笔者在对沈从文家族的调查中发现,沈从文的亲伯伯、亲妹妹以及其本人都曾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现代医学理论一般认为“两代三人”患有精神疾病,其病因基本上可以确定为遗传。而将“疯狂”基因带入沈家的正是沈从文的苗族祖母。据考证,这位女性后来因精神失常被逐出沈家改嫁异乡,并非如《沈从文史诗》《沈从文传》所认为的那样,出

收稿日期: 2012-09-03

基金项目: 东华理工大学博士科研项目“沈从文思想深层次研究”(DHBW201104)

作者简介: 唐东堰(1981-),湖南永州人,东华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唐东久(1984-),湖南永州人,广西医科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临床医学研究。

于担心苗族后裔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改嫁。事实上,据《同仁府志·苗蛮》记载自乾隆六十年以来苗人就允许像汉人一样“诵诗读书,且有列痒序登科第者”。凤凰苗族弟子龙骥还于光绪十年乡试中举,被朝廷授官。况且,当年与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一同征战的田兴恕亦是苗人,此人是沈从文祖父的上级,咸丰年间被清朝封为贵州提督,署巡抚。这些事实表明,苗族不仅能够参加科举,还能与汉人一样做官。金介甫、凌宇等学者关于沈从文亲祖母改嫁的记载实际上依据的是沈从文的陈述,而沈从文本人并没有亲历此事,他依据的不过是儿时长辈们给予的牵强解释而已。这个解释不光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不符合人伦常情,因为一个为沈家生育了两个男孩的母亲被无故远嫁他乡,无论从苗族习俗还是汉族习俗都是说不过去的。

苗汉两族对“精神病”的看法截然不同。在湘西,“精神失常”与其说是被看成“疾病”,毋宁说是“神灵”的降临。正如沈从文在《湘西》中所说,湘西的“巫”并不是依靠后天学习而成的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心理(精神)疾病。只有精神疾病发作的人才可以设坛占卜担当巫师,而一旦其疾病好转便只能重新回到普通人,不再从事巫事,因此,精神疾病在湘西带有神圣的意味。一旦精神失常,他便不再被视为普通人而是“人神的混合体”。人们对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所以在湘西,落洞少女是不能娶回家的,因为她是神的爱人;同样,巫师(婆)也不可纳入日常人伦当中去的,这样会亵渎到神。沈从文的苗族祖母最后被改嫁(或送往)他乡,正是其家人出于这些顾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沈家带有强大的“疯狂”基因,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后代就会患精神疾病。精神病遗传的概率并不是100%,而且即使携带致病基因的人大约有“20%或30%是不会发病的”。^{[1]115}沈从文和她的九妹被“选中”来背负家族中积聚的精神病能量的重担,与他们各自的生理和心理环境存在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些因素都是外在的,它们只能够起到“保护”或者“激活”那些潜伏的基因,而且,真正致病的主要还是那种依靠遗传得来的特殊心理结构。

二

家族遗传基因为研究沈从文1949年自杀事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目前研究者在研究沈从文自杀事件时大多只强调外在的政治风雨对于沈从文的迫害和压迫,而忽视了一个至为关键的原

因——沈从文长期以来的心理疾病。据目前的史料来看,1948—1949年间沈从文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并不大。其妻子张兆和女士在致田真逸(沈从文姐夫)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2]23}以往的研究者为了能自圆其说,常常夸大共产党对于沈从文的政治迫害,并将之视为导致沈从文自杀的主要乃至唯一的原因。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杀都是源自于精神问题,时代政治因素只是外因,起到催化作用。在西方的一项关于134个自杀案例的调查中,2/3的自杀案例都与躁狂抑郁症有关,而没有精神障碍史的人一生企图自杀的比例仅为1%。^{[1]143}精神疾病“源于遗传的事实无可置疑”。^{[1]15}

1949年,沈从文自杀被救之后曾在医院写下这么一段日记:

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提到自己由想象发展,常常扮作一个恶棍和一个先知,总之都并不是真的。真的过失只是想象过于复杂。而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3]147}

尽管学术界对这段话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但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是不容置疑的:第一,沈从文认为他的心理疾病并不是自1948年底才开始的,早在30年代末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出现。1943年他在写《绿魇》的时候心理疾病已经比较严重了,由于没有1949年那么明显,故沈从文将之称为“隐性的疯狂”。第二,沈从文认为即使没有政治风雨的侵袭,按照这个病情的发展“必然有疯狂的一天”。这与目前研究者把沈从文精神失常简单地归为政治风雨的做法完全相反。第三,沈从文认为,这种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是“想象过于复杂”,即陷入幻觉难以自拔,而幻象、妄想、焦虑、混乱恰恰是忧郁躁狂症的主要症状。应该说,沈从文此时对自己的剖析是比较客观的。正因为山雨欲来之前沈从文精神就已经濒临失常,故1949年前后那一点点打击沈从文的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在此,也许有人会疑问——既然沈从文的精神疾病早在40年代就已经有体现,那么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没有人发现呢?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躁狂抑郁症不像精神分裂症那么外显,患者并不总是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相反他们大多数时候与常人一样。像拜伦、伍尔夫这些被医

学证实了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正常的,病症发作的时候只是一小部分时间,人们很容易把艺术家精神上的疾病视为性格上的孤僻乖戾,而不会当做一种精神疾病来对待。其次,“天才”和“疯子”就如硬币的两面,很多的时候人们难以区分,艺术家的独特之处究竟是“艺术天才”还是“精神异常”?

汪洋恣肆的想象是沈从文创作和思索的主要途径,然而这个想象“飞跃”常常超出了理性控制的范围,逾越进“疯狂”的领地。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这个特点很清楚,常常批评他说,你总是“在习惯方式中吓你自己”,陷溺到“想象的泥潭中无从挣扎,终于死了”。沈从文对自己的奇异的思维感到不解,认为小时候将大脑摔坏了。

随着这种心理疾病的发展,沈从文的感知能力越来越紊乱,有时甚至出现视觉、听觉和嗅觉的幻象,从而泯灭了超现实与现实的界限,沉溺于幻境当中无法自拔。在创作《看虹录》的时候,沈从文竟不吃不喝地沉迷在“悦乐疯狂”之中达24小时之久,且“为了保留在印象中的造型”,每一次回忆都会让自己重新疯狂起来。小说的末尾沈从文写道,“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5]341}这个“观念世界”并不是理论建构的世界,而是由“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的“美的抽象”,它们“比梦境更荒唐的实在”^{[5]134},实际上就是非理性的“疯狂”世界。不过对于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而言,沉迷于幻想世界的“固执”究竟是一种创作的激情还是精神疾病的表征呢?或许这两者压根就没有截然的分别,天才与疯子只有一墙之隔,当某种天赋过于发展,超越“界限”,很可能就进入了癫狂的领地。

据笔者调查,发现沈从文所说的这种“疯狂”早在“情感幻异”的《月下小景》就开始了,到了四十年代进而“发展成‘七色魔’式的病态格局”。^{[4]349}不过这时候病情还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因此没有引起人的注意。直到1949年前后政治剧变,沈从文工作的权利受到剥夺时,心理的躁狂抑郁才“变成了一种疾病而并非一种暂时的存在状态”。^{[2]23}

三

学术界似乎流行一种偏见,如果某位艺术家、思想家被证明精神有问题,其创作似乎就丧失思想和美学价值,因为谁也不愿意去将一个“疯子”奉为大师。正出于这种偏见,很多研究者一直以来都不愿意正视沈从文长期以来患有精神病的事实。笔

者认为这种偏见是大可不必的,天才与疯子常常只是一墙之隔。古往今来,著名艺术大师中的精神病患者比比皆是,如拜伦、梵高、贝多芬、爱伦坡等等。心理学家早就发现,轻度的狂躁与抑郁会让人的感知能力变得超常的“敏锐”,从而“感知”到了一些非感官的幻象。梵高越是在疯癫的时候,创作的画作越卓越不凡。以至于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认为,“所有杰作都出自于精神病患者之手”。^[1]

同样的,这个“隐性的疯狂”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对沈从文的创作稍做考察,不难发现在沈从文30-40年代间创作中,“癫狂”“沉迷”“狂热”与“死亡”是最为常见的主题。“疯狂”以及与“疯狂”相关的“痴”“癫”“迷”,是沈从文40年代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据笔者初步统计,这些词大约出现了60次。不光如此,精神疾病还让沈从文40年代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非理性“狂诗”色彩。例如: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有什么人能用绿竹作弓矢,射入云空,永不落下?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静之广大虚空。^{[5]43}

上述引文行文节奏密集而急促,思维跳跃变换飞快。其中的“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等短语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范围。这样的语言在沈从文40年的作品还存在很多。由于语言和思维是密不可分的,“语言形式反映思维,或者说,语言是思维的镜像”,语言形式不仅表达了思维的结果,还显示着思维的方式。^{[6]275}沈从文狂诗的语言也表明了其思维的“非正常”状态——“发疯”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40年代在《生命》《烛虚》《绿魔》《看虹录》等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对于“美”(艺术、自然或女性身体)的心醉神迷和“悦乐疯狂”与其非理性的“疯狂体验”是一致的。

家族“疯狂基因”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整体转变,使其40年代的创作(如《烛虚》、《七色魔》、《看虹录》等)呈现出极强的“非理性”色彩。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的注意,事实上沈从文曾在1949年的日记中明确表示过,《绿魔》是其精神错综的结晶,《看虹摘星录》中的痴狂入迷体验也是自己生命形态的本真纪录。沈从文40年代作品所呈现出的“非理性”色彩都根

植于其隐秘的精神世界。例如在小说《主妇(其二)》中,沈从文写道:

目前世界对于我作成一种崭新的启示,万物多美好,多完整!人类抽象观念和具体知识,数千年积累所成就的任何伟大业绩,若从更深处看去,比起来都算得什么?田野间依然是露水,以及那个在露水朝阳中充分见出自然巧慧与庄严的野花。一种纯粹的神性,一切哲学的基本观念,一切艺术文学的伟大和神奇,亦无不由之孕育而出。

……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我的生命价值观即越转近一个疯子。不知不觉间两脚已踏到有螺蚌残骸的水畔。我知道,我的双脚和我的思索,在这个清晨清新空气中散步,都未免走得太远了一点,再向前走,也许就会直入滇池水深处。^{[7]322-323}

这种风格的文字与前面例子一样,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狂诗”的色彩。沈从文曾在写给程应镠的信中对写作此小说的精神状况做了明确的交代:

犹记得三十四年九月八日,住桃园写了一晚作为送三小姐纪念礼物的文章。走到村子外边去,越过马路躺倒带露水的荒坟间,头中发眩,觉得十分悲戚。^{[2]192}

上文中所说的“送三小姐纪念礼物的文章”就是《主妇(其二)》。显然《主妇(其二)》的“狂诗”色彩与作者“头中发眩”的精神状态是相关的。目前学界在研究沈从文40年代的创作时恰恰严重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常常将这种“非理性”的文学风格视作沈从文有意识的艺术创新,并扣以“哲思散文”、“意识流小说”等等似是而非的“帽子”,借助一些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理论方法,挖掘文字背后的现代派内蕴,实际上都走错了路。离开了主体创作时的精神状况,空谈文字,只能导致过度阐释或牵强附会。沈从文研究应该打破那种脱离史料空谈的习惯,重新回归沈从文本身的研究,立足沈从文本人的精神处境来谈作品。

虽然沈从文40年代的创作多是精神“异常”时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意义的狂言乱语。相反,很多天才式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在迷狂之中产生的。没有癫癩,梵高就创作不出传世佳作;没有迷狂,柏拉图认为就不可能有诗。因此笔者认为上述文字不光不是无意义的呓语,还是沈从

文作品中最为深邃的东西,这个东西超越了理性,我们无法用日常的感知方式去感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40年代提出的“神”、“生命”、“抽象”等思想命题也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癫狂中把握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所说的“神”是湘西半原始文化的隐秘显现,因为在湘西巫文化中,“神”的把握也离不开癫狂。“神人相通”是巫师借助一定的仪式(如狂舞、饮酒、服药等)进入到生命的癫狂状态中实现的。对于湘西山民来说,“疯狂”并不是愚痴,而是巫师般的“先知”,他们对于“人自己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不是通过思考(普通意义上的理性思考,论者注),而是通过体验忘我的癫狂状态而决定”。^{[8]57}这种思想方式获得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神圣的智慧。

直到1949年初,风云突变,天地玄黄。脆弱的心灵终于在精神重压下崩溃。正如沈从文本人重读《绿魇》时写下的那样,“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天才与疯子只是一墙之隔,究竟是天才由疯癫激发,还是因天赋而疯癫?对于沈从文来说,或许两者兼有。

参考文献:

- [1] 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 疯狂的天才[M]. 刘建国,译.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 [2]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9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3] 沈从文. 沈从文家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 [4] 凌宇. 沈从文传[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 [5]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2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6] 邢福义,吴振国. 语言学概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7]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0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8] 史怀哲. 中国思想史[M]. 常喧,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卫华